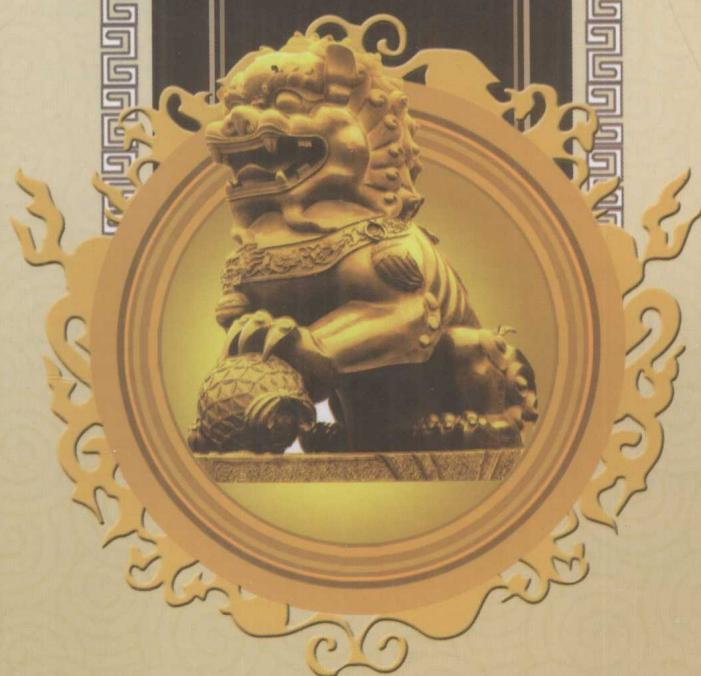


新时期

杨 腾 张兰玲 主编

党建思想研究



新时期党建思想研究

主编 杨 腾 张兰玲
副主编 罗学艳 张 星 赵永进
满曙光 杨清恩
编 委 杨 腾 张兰玲 罗学艳
张 星 赵永进 满曙光
杨清恩 刘艳慧 蒋 华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党建思想研究 / 杨腾, 张兰玲主编.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5
ISBN 978 - 7 - 5610 - 6093 - 3

I. ①新… II. ①杨… ②张…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党的建设 — 研究 IV. ① 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5404 号

出版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刷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发行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85mm × 260mm

印 张: 24.5

字 数: 612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晋寰

封面设计: 韩雪霜

责任校对: 张 珑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0 - 6093 - 3

定 价: 46.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目 录

第一章 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形成 /001

- 一、邓小平的党建活动 /001
- 二、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形成 /012
- 三、新时期邓小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条件 /017

第二章 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色 /020

- 一、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主要贡献 /020
- 二、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主要特色 /058

第三章 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 /065

- 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的关键 /065
- 二、政治建设是党建的核心 /074
- 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082
- 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101
- 五、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111

第四章 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历史地位 /124

- 一、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发展阶段 /124
- 二、邓小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新发展 /128
- 三、邓小平党建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134
- 四、邓小平党建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一面旗帜 /141
- 五、认真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的党建理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44

第五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148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148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国内环境 /161
-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党内环境 /165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 /169

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178

第六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 /182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183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94

三、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01

四、“三个代表”的辩证统一关系 /210

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 /217

第七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223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体 /223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共产党本质论的科学定位 /227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229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概括 /232

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重要理论成果 /237

第八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 /242

一、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242

二、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244

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巩固党的“两个”基础 /252

四、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256

五、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人才队伍 /269

六、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尽快建立制度治党机制 /284

七、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95

八、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努力提高理论学习水平 /301

九、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深刻总结二十年来的主要历史经验 /307

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314

第九章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实践 /321

一、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建理论创新的历史背景 /321

二、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的建设的新举措 /322

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建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 /325

四、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的特点 /332

五、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建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 /336

第十章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创新举措和深刻启示 /338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践，深化了我们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认识 /338

二、通过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先进性建设 /341

三、围绕永葆先进性,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343

四、保持党员先进性必须体现时代要求 /344

五、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 /346

第十一章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50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的先进性 /350

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涵 /352

三、党的先进性建设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关系 /355

第十二章 党内民主建设的新发展 /359

一、新中国 60 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 /359

二、发展党内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产物 /363

三、党内民主的实质及特点 /366

四、发展党内民主重在制度建设 /369

五、党内民主建设的有效途径 /373

六、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的新发展 /376

七、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新发展的启示 /378

八、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新时期党建的伟大旗帜 /380

参考文献 /385

后 记 /386

第一章

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既是新时期党建的实践经验的结晶，又是对历史上党建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1924年成为正式党员，是一个具有73年党龄的老党员。70多年来，他不仅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党正确的与错误的、成功的与失败的实践，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站在党的高级核心的领导阶层，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党的核心领导人，指导和参与了党的重大建设和改革实践，成为全党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在他伟大、光辉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或党的政治工作，一贯重视党的建设。认真研究邓小平的一生包括他参与、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对我们研究邓小平思想，特别是研究邓小平党建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的党建活动

邓小平在1920年10月抵达法国马赛开始勤工俭学，1922年在他18岁时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始，到1997年逝世，在70多年中，他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为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研究。

（一）建国以前邓小平的党建活动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建立，是党的建设的第一个时期。邓小平在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革命活动家。邓小平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中国共产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他还担任过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1926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他在当时写的自我传记中说道：“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斯科

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①1927年春，邓小平接受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的中共组织的书记。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小平于六七月间转赴汉口，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不久，汪精卫主政的武汉政府也公开反共，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的需要，他由原来的邓先圣（学名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1927年8月7日他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纠正和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底，他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1928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协助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第二，积极创建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7月，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广西，作为组织者和领导人负责广西的革命工作，准备武装起义。同年10月，任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统一指挥左右江地区的党组织和军队。在此期间，他明确指示要加强党的建设并为前敌委员会制定了党组织建设的正确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同年12月，他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左右江苏维埃政府，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在他的指导下，1929年2月20日颁布了《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指出军队和地方各级党部要以最大的力量来注意党的建设，健全党的组织系统和支部生活，实行党内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并大量印发《党员须知》，还亲自编写党内的教材，印发成小册子，督促大家学习。1930年2月，他同李明瑞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八军，兼政治委员。同年9月，邓小平又指导前委颁发了《前委通告》第六、七号，更加明确指出：“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强党的纲领宣传。”通过做大量的工作，使左右江根据地的党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革命运动发展得红红火火。

第三，在中央苏区，坚决与错误思想做斗争，为建立健全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31年8月，邓小平从广西到达江西苏区，就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3年春，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在此期间，他坚持正确主张，重视党的建设，坚持党性原则，极力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这些思想被“左”倾主义者作为悲观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加以批判。此外，他在担任《红星》报主编时，积极宣传党的主张，这份报纸特别受到战士的喜爱，并被他们称为“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红军党的工作的指导员”等，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这份报纸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注意办好理论性、知识性与文艺性的副刊和《军事知识》、《俱乐部》等栏目，吸引了广大的指战员。《红星》报在我党我军的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邓小平对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大贡献。

第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十分重视军队中党的建设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通过军队的党组织帮助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倡导民主政治，强调共产党员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要有民主作风，在各项工作中都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1935

^① 《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求是》，1997年第5期。

年1月,邓小平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5日,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0年12月,在《党的生活》第26、27期发表《迎接一九四一年》,提出要将党建的重心放在加强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政策的领导,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纪律上。1941年4月15日,在《党的生活》第35期发表《党与抗日政权》,指出:“‘三三制’是我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行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①在这段时间,邓小平一方面注重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党支部的领导和堡垒作用,坚持干部的轮训制度,重视党对广大党员、干部、战士的思想教育,在紧张的战争中充分发挥了党的政治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巩固军队、提高战斗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中,积极捍卫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有着特别深刻的认识,因而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不断宣传毛泽东思想。1943年11月,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动员会上说:“我党自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习,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不但没有犯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②同年底,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还说,整风的目的就在于要以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思想,使我们全党的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党员更加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心一意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整风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增强党的战斗力。1945年3月他在一次关于形势分析的报告中又一次提到:党员要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表明,邓小平是我们党内较早提出毛泽东思想、并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连在一起的倡导者之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同年,邓小平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该军区政治委员。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他任书记。在此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等一起指挥千军万马转战于黄河南北的激烈战争中,他仍然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和军队的政治工作。他强调要加强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在新的解放区,严格地执行党的新区政策,纠正新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错误思想,并发表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等一系列的讲话和指示,根据中央的方针,结合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对整党、土改和工商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在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军委做出关于全军组织编制、番号的决定,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邓小平任政治委员,1949年1月20日,他指示所属各纵队党委认真检查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报告制度和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等的指示》的情况时指出,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1949年9月17日,他在南京市党支部及排以上干部党员大会上作了《论忠诚与老实》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8页。

报告,而且还反复强调要教育党员、干部提高警惕,防止在革命胜利后出现腐化现象。

从这些思想和实践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就非常关注党的建设,为党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的党建活动

194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1949年12月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四次会议,并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7月,调到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1954年4月,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4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为我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担任总书记期间,为在执政的条件下搞好党的建设、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 西南局时期的党建活动(1949年11月—1952年7月)

这一时期,是邓小平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邓小平党建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重视党的策略建设。由于解放战争进展迅速,一些新解放区尚未充分巩固,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当时的形势要求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策策略: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思想等。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以中立的人。在贵阳,还物色一些左翼分子、中间分子乃至个别的不积极地反对我们并表示愿意靠近我们的右翼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这些策略和方针与当时中央的政策是一致的。

其次,开拓和改善党的领导方法。邓小平指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子。实现领导的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思想要用笔杆子写出来传播推广,而且经过写,思想能够得到提炼,比较精密。并指出,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决议、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领导的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更大得多。把笔杆子和新闻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主要方法,在解放初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中,邓小平是比较早的。

最后,特别强调整顿党的作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搞好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在这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1950年6月6日,他在中共重庆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党内主要错误倾向就是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两种倾向。我们提倡的正确作风,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这种作风是背道而驰的,他们不可能完成任务,其结果一定是损害我们党的工作,损害党的利益和信誉。另外,在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和在发展中的蜕化、腐朽的思想也是必须在整风中要克服的。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还提出了要严格党支部的生活,认真建立学习制度等措施。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工作特点和思想观念,对于我们党新形势下的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八大前后及“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的党建活动(1952年7月—1966年)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的时期,对于邓小平的一生来说,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阶段邓小平从中共中央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到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位居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为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积极维护中共中央的权威,服从党的总路线。1954年1月,邓小平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指出,局部应当照顾全体,中央和地方要统一。因为,地方是在中央的领导下的地方,局部是在全体中的局部,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该服从中央,局部应该服从全体。如果不这样,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财政部门的全局观点就是服从总路线,保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当时兼任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尽管不是主持领导工作,但他要求财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全局的观点,一切围绕总路线这个政治中心来做,说这就是讲政治,这是对实现党的领导的具体化,是在政府部门进行党的建设的一个范例。

其次,积极筹备党的八大,主持党的章程的修改。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开始从一个主要领导人的高度全面思考和探讨党的建设问题。八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对八大的有关事项做了说明。8月3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又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七届七中全会决定的六个文件草稿作了说明。9月13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又对八大主席团名单、发言等问题作了说明。邓小平的这些工作,对八大的顺利召开起着重要的作用。1949年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党组织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员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党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所以,面对我们党的组织工作和对党员的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党章的修改成为必然,而且党章的修改一方面要继承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另一方面还要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提出新的要求。这就要求做这项工作的人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邓小平去完成。实践证明,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也同党的八大一样永载史册。在这篇报告中,邓小平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他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让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了而是比过去增多了。”针对党内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他指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①。同时还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结合执政党的特点,全面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②并要求我们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健全党内的制度,把党的生活搞正常。为坚持这一原则,我们“必须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4、21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5页。

到贯彻执行”^①。邓小平关于上述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真知灼见，是依照党规党法治党的新思路，即执政党在重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靠制度解决问题。这是中共建党史上的制度建党的萌芽，对我们党今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再次，坚决反对党内的一系列错误倾向，克服党内的骄傲情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一些人利欲熏心，搞派性斗争力图篡党夺权。如1953年到1954年党内发生的高饶事件。当时的高岗、饶漱石、林彪等一伙试图打倒刘少奇，做中央副主席，就找到邓小平谈话。邓小平当时就指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来说，刘少奇是好的；改变这样的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是不恰当的。1955年3月，邓小平还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高饶长期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论述了党与高饶反党阴谋活动斗争的经过和重要意义，总结了这场斗争的经验教训。1959年林彪任国防部长以后，提出学毛泽东著作是学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而且学习毛泽东著作，不一定背那么多，背上那么十几句就行了。康生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指示、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时间国内出现了割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目前，在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什么东西都说是毛泽东思想；二是马列主义很少讲了，割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联系。并强调，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能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在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的同时，还要求全党坚决克服党内的骄傲情绪。1954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的一些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地步。骄傲的人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因而常常觉得党和别人对他重视不够，对他没有什么温暖，反而觉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对他很好，对他有温暖，而这种东西恰恰是一种腐蚀剂。骄傲，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骄傲会使党的团结和党的工作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而骄傲的人也必定会犯错误。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观念，反映了他的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深的理论修养，也反映了他敏锐的洞察力，这对于我们党今后的建设和保证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和改革，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早在20世纪4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党权高于一切，以党治国的观念是错误的。党员不能包办一切，不能以党代政。1957年他再次指出，党委领导必须是抓大事，管方针政策，党委去抓枝节问题，一揽子管，这肯定要失败。因此，必须使党真正成为讨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机构。这个机构要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主要是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他第一次提出了破除干部的职务的终身制，改革干部的管理制度，使干部真正能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坚持党员干部的轮训制度；党员干部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权力就是责任、义务。1956年11月17日，他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含义或任务，概括地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并在第七、八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我们既要反对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5页。

主观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在此后的《今后的主要任务》、《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等报告中也提到了搞建设要比搞革命困难，所以更应该对共产党员及其干部加强教育和监督等问题^①。1962年3月，针对1957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了对几年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问题，制定并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规定了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这对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之，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使党内生活民主化，优化党风和社会风气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党建活动

1973年邓小平恢复了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5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一阶段，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局面，置个人安危和荣誉于不顾，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这个时期，他先后发表了《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各方面都要整顿》等重要讲话，力图把党的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都纳入正轨。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以，邓小平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1976年4月再度被撤销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功勋，也因为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中主持了全面的整顿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在党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中，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一切职务，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邓小平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认真吸取了党在以往建设中的探索成果，深刻地分析了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教训，纠正了长期以来党的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把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上来，逐步实现了党的建设的伟大转折，形成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一整套建设理论，继承并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党建活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理论的发展和贡献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认真思考中国的问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系列的思想指导，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理论。邓小平对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拨乱反正，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起了推动作用。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十年动乱带来的重大灾难，人们越发认识到“左”的错误的危害。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错误不能重演，一定要拨乱反正。

邓小平以他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抱着对人民和国家负责的态度，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要求人民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坚决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把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对毛泽东个人的功过做出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7~274页。

了准确的、科学的评价。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决议》的通过，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了党的团结，标志着党在思想上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同时，使党外的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为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2) 在指导中国建设的发展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解决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在摸索中国建设的道路问题，走了不少的弯路。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后，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初步进展的基础上，在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与邓小平在党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制定的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形成。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做出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①1989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上海等地方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的问题，进一步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3) 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核心的位置，积极推进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以他过人的胆识，首先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即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来，在视察东北三省时又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36天的重要工作会议，在邓小平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由于邓小平的这一提议，改变了这次会议的方向，使会议的中心议题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如果再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③。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1979年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全面论述并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至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说明了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国国情内涵。1983年7月，他提出“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④，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

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①，1987年他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时指出了“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②，1978年8月他作出了当代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③。党的十三大正是按照邓小平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概括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标志着党的基本路线的正式形成。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过程中发表重要的讲话，科学地总结了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和经验，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④。这些科学的论断反映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

2. 建立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此后，在邓小平的亲自努力和积极倡导下，党的制度建设不仅在理论上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制度建设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得出“制度是决定因素”的重要结论，这说明邓小平已经认识到制度建设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它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路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⑤党的制度建设的这种目的，决定了它的目标和方向。关于党的建设的目标，邓小平曾作过多次的论述。1980年8月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⑥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⑦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在日本朋友谈话时指出：“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⑧民主化是党内生活中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具备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客观条件，但我们对党内民主问题还缺乏认识，民主集中制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因此，党的建设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发展党内民主生活。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草案)，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了党的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没能使党内民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373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

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邓小平认为：“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检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并清除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①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实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

(2) 制定了党的制度建设应当遵循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党的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律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制度建设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即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必须自始至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决不可以脱离党的领导；制定出来的制度必须有利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能削弱党的领导。二是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民主的原则，保证制度建设的公开性，以便党的一切组织和党员遵守；保持它的参与性，让党员群众参与党的制度建设中，增强他们的制度意识，调动他们监督制度执行的积极性。三是制度建设必须坚持整体性的原则，保证党的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并使党的制度建设和国家的法制建设相衔接，使党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四是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科学性的原则，保证党的制度的合理性、可行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广大党员和群众在执行党的制度时的积极性。另外，在党的制度建设中还要借鉴国外党的经验，邓小平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②五是必须坚持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并重的原则，使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相互支持，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重点。邓小平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党的工作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党的制度建设重点应放在建立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监督制度上。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因为民主集中制规定和制约着党的各项制度建设，是党的制度建设的中心。邓小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的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③这个论断精辟地概括了民主集中制的全部意义。所以，我们党始终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1980年2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正草案、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9月通过的新党章、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都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了重要的论述。

要建立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指导下工作，保证党内民主的真正实施，就必须加强党内的监督，完善党内的监督制度。所以，邓小平把党的监督制度也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点来抓。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从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页。

严治党的要求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当前，世界风云变幻，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加强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1986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时指出：“建设好的党风，思想教育很重要，制度建设也很重要，必须努力改革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得到有效的监督。”1987年5月，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关于整党的基本总结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中提出，“健全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并强调，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健全党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外，还要大力健全党的干部制度和监督制度。这些重要的制度，有的已经或正在制定，但有的至今还没有着手研究和制定，党的组织部门必须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专门的力量，抓紧进行这项工作。这是我们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有力保证。

(4) 关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把干部制度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当然，组织路线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机构臃肿怎么解决，退休制度怎样解决等等。庙有那么大，菩萨只能那么多，老的不退下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现在有些地方对选拔领导班子的年轻人，还是论资排辈，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①在邓小平干部选拔思想的指导下，198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对干部任用工作作出了若干具体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制定颁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指出选拔领导干部既要继承和发扬历史的优良传统，又要总结和吸取新时期的人选人的新鲜经验。它是党内关于干部工作的重要规定，是选拔优秀人才、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的制度保证。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党员干部的“四化”。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乏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的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②1982年1月，邓小平再次强调：选拔优秀中年干部，实现干部“四化”，这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198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中指出：党的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党的干部制度的改革，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3. 注重党的作风建设

(1) 提出恢复和发扬五个方面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7年在党的十一大上，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有一条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2、19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1页。